

友情洋溢之梶井剛先生

錢其琛

一、簡介

日本的電信電話公社第一任總裁梶井剛博士，四十六年應邀來臺訪問，除參觀我方電信設備以外，並舉行座談會多次，討論電信營運政策，交換技術規範，及微波無線電等問題。梶井氏在公開演講及私人談話之間充分表露對中國熱愛的友情，即以捐助交大電子研究所儀器設備一批及商定交換工程業務人員考察實習辦法兩事，都是很顯著的明證，故願專文介紹。



梶井氏現年七十二歲，當他在二十四歲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電機工程系以後，即入遞信省充任工程師，並兼任大學講師，後以「朝鮮海峽海底電纜載波報話系統之研究與實施」為論文，而榮獲工程博士的學位。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曾往英、德、美各國研究電信約一年，回國後即擔任日本電信的設計與研究等工作，並在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三八年兩度訪華。他是在一九三八年轉入住友總社工作，以後並擔任日本電氣株式會社總經理，住

友會社理事，及日本放送協會理事等重要職務，以努力日本電信事業的發展。大戰結束以後，改任為日本電氣通信協會會長，並兼任日本東海大學校長。一九五二年八月日本電信電話公社成立，梶井博士榮任第一任總裁，並于一九五三年前往歐美考察，並代表日本以顧問資格參加在舊金山所舉行的國際工業發展會議，一九五七年曾訪問中、泰、越等，促進好的關係，加強電信的合作。梶井氏是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辭去日本電電公社總裁職務。

梶井氏現仍身兼數職，除任日本國有鐵道技術顧問及文部省大學設置審議會委員，並為促進日本對世界各國之經濟與技術合作，擔任亞細亞通信協力會的社團法人以外，並任總理府科學技術會議議員，此會議由日本首相直轄，負責制定科學技術的基本政策。

二、電信方面之成就

日本的電信事業，先後由遞信省及電氣通信省經營，二次大戰後，破壞極甚，恢復不易，建設資金無

着，困難重重。自一九五二年改組為日本電信電話公社成為公司組織以來，在第一任梶井總裁領導之下，五年（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建設計劃會提前完成，一切突飛猛晉，在一九五七年其全國電話機數已增達三百四十五萬具（平均每百人三·八具），用戶增至二百四十萬戶，列為世界第五位，預計至一九七二年其全國電話機數可增至八百萬具（平均每百人約八具），用戶可增至五百六十萬戶。

日本電信電話公社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共計用資金日元二千七百億（約合美金七萬萬餘元），其所以能籌得如此鉅額，梶井氏說是由於下列八種因素：

- (1) 改組為公社後，可增加效率，用科學管理方法，而不按政府機關之行政管理，並可按長期計劃進行，不致每年因政局而更動。
- (2) 會計制度，獨立創設合用之制度，不受官廳會計制度之拘束。
- (3) 預算制度，除總收支數每年須經國會通過後，預算之動用，公社有權靈活支配，如人員待遇及研究發展支出均可自行決定。
- (4) 發行公債，分兩種，一種攤由電話新用戶承購，一種普遍發行，多由銀行承購。
- (5) 重估資產，戰後幣值變動，所有資產經重估後增為原帳面之二十五倍，五年折舊達一千億日元，佔五年建設資金約三分之一。

(6) 盈餘：公社每年盈餘，概不繳解國庫，且年度內未用完時，可以積存移歸次年或將來應用。

(7) 捐稅：公社可免付捐稅，歲息或他種對政府之繳款，其理由為公社之資金來自民間，並非政府之撥款，故政府應予豁免捐稅負擔。

(8) 費率：公社成立後，以費率比其他物價指數落後甚多，經國會核准增加百分之二十。

臺灣方面過去的建設還是賴美金貸款及繳庫後的少數盈餘，其數額是較需要仍然相去甚遠，今後如謀較大量的擴充，勢需另行妥關財源。

三、與中國之友情

梶井氏于四十六年七月三日在臺北由中日文化經濟協會，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及電信總局聯合舉辦的公開演講中說過：「日本是在一百年前一直由貴國文化所指導，並受中國恩惠的國家。自九十年前，封建制度被推翻以後，當時參加此一革命的日本人士，留學歐美後，覺得今後的日本，應該學歐美的科學技術，自圖發達，自此以後，日本對於科學技術，非常注重努力。本人於戰前曾經二次到過中國。一九三六年到上海時，上海電話局長是徐學禹先生，是我在三十五年前，一九二三年在德國柏林認識的一位最親密的中國友人。自此以後，一直苦無機會再見面。戰爭結束後三年，與徐先生在東京又相遇。當時本人遭到整肅，正處於失業狀態中，因此生活很困難。徐先生對

本人表示極願援助。使我深深感佩中國人的友情是如何的熱誠，如何的篤厚。患難時的友情比任何東西更爲可貴，當時本人曾請問徐先生，欲了解中國，應讀何書？徐先生介紹我一本各位所知很有名的哲學家林語堂先生所著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本人讀此書後，覺得我們在精神上，必須用東方的哲學，加以修養，然後再向歐美學習科學技術，自圖發達，否則就不能成爲「車輛的完全兩輪」。我們就從他這一段話就可以知道他對中國的友情。

四、捐助電子研究所儀器

在梶井氏未辭去日本電信電話公社總裁之前，適母校電子研究所成立，當時缺乏儀器，經函請梶井氏設法捐助承其熱心協助，分向該社及日本通信機械工業協會約三十六個廠家捐贈總值美金二八、五七七·三三元的儀器設備一批，以供電子研究所做研究實驗之用，此種熱情我們衷心感謝。梶井氏說過：「我在年青時，日本曾有一次大地震，將東京的電話全部毀滅。當時我們的先輩會決定改用自動電話，並向美、英、德各國購進自動電話交換機，然而此項機件，實不應該長久購用外國貨，我們當時會主張應即自造，故致力提倡國產化，並向民營各公司亦鼓勵其生產。我們極願協助發達貴國電信事業，並很樂意將日本所製造的機件，售給貴國。但發達貴國電信事業的基礎，繫於貴國工業的發達。所以貴國亦應先從簡單的機

件，着手設廠自造。此爲本人所要誠懇奉勸的一個問題。我們對於發展貴國工業，亦不惜任何技術協助」。

他又說：「本人曾經竭力主張興革工業，以材料自足自給。但前次考察歐美返回公社後，我改變初衷，主張向歐美購買部份機器，然而年青的同仁們，却照從前我們所教，極力主張提倡國貨，拒不贊成。提倡國貨與關閉主義完全不同，假若歐美有比我們更優良的東西，我們應該樂於接受指教，藉以自謀進步，但不可受教於各國而自感滿足。因此，我們很努力於研究工作，並極願將我們的研究貢獻於世界的進步」。

他又說：「年青同仁們常抱如此感覺，怕自己的研究，付諸實行時，遭遇失敗應負的責任。本人曾勉勵他們說：『此項責任應由我負責，請繼續進行吧，若不失敗，絕無成功可言，失敗爲成功之母，請不要顧慮金錢的浪費，我們願爲研究不惜投資。』這就是他主張國際技術合作，和鼓勵青年研究發展的明智決擇。

最近有人去日本開會，在會議席上遇到他，他就請這位先生轉告筆者，希望多派技術人員赴日歷練，假使我國所派人數限於交換工程業務辦法，其多派人員在日本之費用，他可在亞細亞通信協會或科學會議方面設法籌措，他這種幫助我們培育人才的熱忱，更令筆者感佩不置。

談談當前的經濟情勢

尹仲容

四十九年已經過去，現有的統計資料還不能允許我們對這一年的整個經濟發展作一總結，但幾個重要的經濟指標，我們已有最粗略的估計。根據這些估計，真實國民所得增加了七·三%，平均每一個人的所得增加了三·八%，兩者都是四十三年以來增加最多的一年，工業生產指數也增加了一五%，農業生產指數在接連的天災影響之下，也增加了二%，至於全社會的毛投資額，雖無統計數字，但由於「八七」水災的重建和其他鉅大工程，爲數當亦很大，國際收支方面，工業產品出口的增加足以抵銷農產品出口的減少，進口則並無顯著的增加，同時，由於儘先利用美援的結果，使外匯準備也達到過去所未曾有的高峯，物價方面，雖然四十九年十二月較四十八年同月上漲了一一·七%，但尚未演變成循環性的上漲，人民對幣值的信心也未動搖。所有這些指標，都一如以前各年，顯示着臺灣經濟的進步與繁榮，把這一年的情形，和過去十年來長期的發展趨勢，以及我們每個人都親身經歷到的生活水準提高，併在一起看，更使人覺得我們經濟進步的顯著，也更增加我們對臺灣經濟前途的信心。

但任何一件事，我們決不能只看好的一面，也應該同時看到不好的一面，必須兩面對照的看，才能了解真相。我們的經濟有好的一面，也有令人憂慮的一面，而這一面尤其值得我們的注意和檢討。

一、工業進一步發展將遭遇困難

在過去十一年工業是發展最迅速的一個經濟部門，新的工業不斷建立，舊的工業不斷擴充，生產量則直線上升，自四十一年至四十九年，增加了一·四七倍，即以去年而論，生產量也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不過在這段時間，工業祇沿着兩條路發展：一是在國內有足够的市場；一是在技術方面比較有把握。因此，發展工業祇遭遇兩個困難：資金供應的短缺與缺少企業家出來領導組織。關於資金供給方面，由於美援的協助和通貨膨脹下所產生的國內強迫儲蓄，大致尚可應付需要，關於企業家的領導與組織，除由民間供給一些企業家外，政府機關也擔當了一部份責任，現在大多數稍具規模的現代工廠，差不多都是由政府機關設計指導並予協助而創辦的。

但是這種情勢現已有所轉變。在資金供給方面，除美援仍將是一個重要的來源外，國內儲蓄的迅速增